

# 疫病题材科幻电影中的“人”

陈航直

在科幻电影中，灾难或疫病题材并不少见，从早期的《人间大浩劫》(1971)，到经典的《生化危机》(2002)，再到初看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的《传染病》(2011)，这类电影的想象因素一般基于既有的科学成果或科学性假设，以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而开始，人们便要面临灾难或疫病导致的极限处境，集中表现为一种末日感。在这之中，很多人物的塑造都值得细细品味。

## 为人类命运向前一步

在抗击疫情一线涌现了诸多英雄人物，他们奋勇“逆行”和死神进行殊死搏斗。而在此类题材的科幻电影中，不乏面临“灭顶之灾”时挺身而出的人物。在《人间大浩劫》这部上世纪70年代的硬核科幻电影中，主角斯通博士作为野火小组负责人被征召应对棘手局面。“承受”是他的关键词，不仅要面对导致了一个城镇的人死亡的“铲子”卫星，亲自找回卫星开展探究，而且他早前的建议被参议员称为“斯通博士为九千万美元给山姆大叔肉麻的恭维信”，野火小组的同伴们也因怀疑其参与生化武器计划进行指责。他通过“有机团结”的方式把小组组织起来，弥合他们的矛盾，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小组成员通过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其中几次出现观点分歧和士气低落，他都及时地将大家拉回正轨。而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专业而有担当的人在第一线承受了许多，我们应当深深敬重。

影片有大量室内戏，尤其是细腻刻画了科学探索的过程，这些略显冗长的场景可能令人乏味，但这种老派的朴拙在普遍追求感官刺激、大型场景和快节奏的当下科幻电影中显得非常稀有，倒更能凸显斯通博士作为科学家的专注和面临的煎熬，同时也展现了科学探索未知的困难，这需要学识、经验、时间，甚至还有运气。此外，他的情绪并非毫无波澜，面对妻子的担心挽留，他与妻子柔情一吻，但随即决然转身，面对工作人员错漏了重要信息，一直温文尔雅、冷静睿智还带点幽默的他勃然大怒，而最后他在听证会上对下一次生物危机的担忧，以及“我们该如何处理”的提问，时至今日依旧值得思考。

《生化危机》的故事开始于保护伞公司的一次“意外事故”，女主角爱丽丝并非一出场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她面对的是双重的未知，一方面是失去的记忆使她的知识和经验结构存在缺失，难以感知到已存在的风险，另一方面是紧迫的局势下，即将面临的未知风险。但哪怕没有做好准备，甚至正在遭受失忆的困扰，她依然坚定前行。因为在严酷的环境中，要么往前走，要么一命呜呼。从那句简单的“继续走”，到背起书包去重启“红色皇后”和坚定的“我们要出去”，再到违抗“红色皇后”的指令，情节上的关键点均由她的决策行为推动，并带领大家冲出困境。

## 难以被简单定义的善恶

在灾难和疫病带来的重重考验面前，本就难以被简单概括的人性善恶变得更加模糊，尤其是对处于风暴之眼的人物来说。在《卡桑德拉大桥》(1976)这部经典影片中，麦肯齐上校无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恶人”，尽管他也曾耐心征求斯切娜医生的意见，尝试用直升机将患病的恐怖分子吊走，并第一时间和张伯伦医生探讨，但从他步入世界卫生组织大楼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使命就是要阻止病毒传播、掩盖研制生化武器的丑闻，也正是他的决定让火车驶向卡桑德拉大桥。但他的“恶”其实难以被简单定义，就像“我在你的眼里一定是一个恶魔”这句台词一样，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为，也很清楚自己的下场。上校显然面临着上级的监视，从一开始他就置身于类似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使得一个可能还有些善心的人做出了恶的决定。

在《传染病》这部铺陈着诸多扁平化群像的电影中，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齐佛博士是比较丰满的人物。他怀疑萨斯曼医生冒险研究是为了发文章，把封城的消息第一时间泄露给了妻子，在和网络大V

艾伦的连线中颜面尽失，还没通过抽签得到了第一批疫苗。但他在防治疫情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按部就班的工作，最后还把本是给自己的疫苗注入了清洁工的儿子体内。他有着政客圆滑、职业的谨慎和深厚的情感，对他来说，公众的信任和共识是必须去建立的。他必须使人们相信对的而不相信错的，使人们有正确的观念并听从引导，但这极其艰难。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今年2月在《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中，便抨击意大利政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是过度的，指责“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以及恐惧状态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的真正需求。然而眼下意大利的疫情正逐步向失控发展，比起阿甘本所担忧的人们支持例外状态，以“安全”的名义接受一系列严重限制自由的措施，在人的生存权面前，似乎暂可不必简单视为威权主义的生命政治与自由个人选择之间的二元对立。

## 灾难中的百态众生

灾难有时是面镜子。当灾难来临时，有人可以为了亲人甚至陌生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有人却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不惜牺牲他人。《传染病》中以“真相”自居的网络大V艾伦为了一己私利，谎称感染了病毒，并以连翘能够治病的谎言吃了“人血馒头”，他的行为导致了连翘的抢购、秩序的失范和更多人的感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片中大众也正是他的“同谋者”，并最终自食苦果。在对其施以道德谴责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在对他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是否穷尽了人的生活的所有可能性，是否对其有足够的了解，毕竟他在和齐佛的对话中，问出了大众想知道的问题，说出了大众想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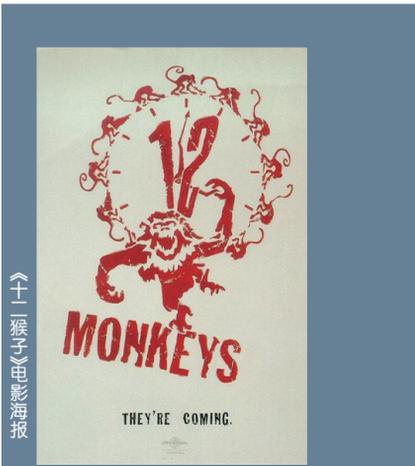
在《末日病毒》(2009)里，4个主角中看似最没有存在感的凯特，实际上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她敏锐地发现小女孩患病，保持警惕第一时间熄灭篝火，每到一处试用公用电话，以及她对丹尼、波比、布莱恩等人的态度等等，短短80分钟的电影里，有太多处细节让人不寒而栗。我无意重提“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性”这样的陈词，但影片最后丹尼的独白“平生第一次，我感到孤零零的，我们到了，相对无言的两个陌生人”或许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表达我们的态度和感受。

在灾难与疫病来临的时候，恐慌、无措、焦虑、脆弱成为了“大多数”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人间大浩劫》中的凯伦·安森就是一个极具寻常感的角色。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她认为“野火就像是一个游戏”，正如一个普通人面对瘟疫时的隔世感，让我们倍感真实。她的三句台词可以代表疫情来临时很多人的心理活动：“害怕，不相信真的会发生，确实真的发生了。”但当她对真实性给予确认之后，便真正地投入到幸存者的治疗和医护中。我们应当对这种害怕给予最深切的理解，这不仅是情可以体谅，于理也是人在面临未知恐惧时正常的生理反应。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许多像凯伦·安森一样的医护工作者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中，他们可能也有害怕，但带着害怕依然战斗在一线，值得我们尊敬。

《末日病毒》中的父亲弗兰克也是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他眼眶湿润抱着女儿唱着歌的场景令人深深动容。他清楚地知道他下了车就会被拿下，等待他和女儿的只有死亡，但他依然下了车抱起了虚弱的女儿，以儿歌相伴缓慢走向死亡。在《惊变28天》(2002)中，信件投递员吉姆醒来后面对的是一个破败杂乱的伦敦。他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身后广告牌上的人物笑得很灿烂，但一无所知且身体虚弱的他却要面对“暴怒”病毒带来的可怕灾难，这种无助、彷徨和恐惧很容易使我们产生共时性体验。对个体来说，当遇到这种外部困难的时候，因为需要避免感染等原因，很难像其他情况一样从群体中获得更多支持，而且失序状态下人类本性中的野蛮被激发，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吉姆有着普通的工作，热爱自己的父母和往日生活，没有超凡的智慧和

体力，懂得心怀感恩。而从对被感染者挥动棒球棍开始，他变成了更有担当的人，也是塞雷娜和汉娜的依靠，尤其是当到达曼彻斯特遇到一群散兵时，他展现出了面临绝境时死而生的勇气和毅力。

重温灾难与疫病题材的科幻电影，能够让我们对于影片中灾难来临时英雄的挺身而出、风暴中心人们的艰难抉择与脆弱无助的大多数民众有着更生动而具象的理解。对于我们来说，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会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伏笔，人类行为的不断扩张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在灾难带来的极限处境中我们该如何抉择等。诚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获得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希望这种知识和记忆，我们能够记得更久一些，能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遗忘。



《十二猴子》电影海报



《传染病》电影海报



《生化危机》电影海报



《末日病毒》电影海报

尸袋中的那张脸。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当灾难和疫情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如此渺小而无助。医生是对抗疫情的主力，在电影《传染病》中，出现的医生不止米尔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女医生艾莉。她虽然不在第一线，但在在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在实验室投入研究，分析病毒的结构与致病原因，竭力加速疫苗的研发。为缩短疫苗研发的周期，艾莉毅然将新疫苗给自己注射，甘愿做第一个人体试验品。好在试验最终是成功的，否则她将付出的就是自己的性命。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群最可爱的人，电影里的米尔斯和艾莉就代表了那一批批逆行的医护人员。在这个“他人即地狱”的特殊时期，这些白衣天使不惧疫情、无谓牺牲地奔赴前线。在灾难与疫情面前，没有能上天人地、救人于危难的超级英雄，也没有能在最后一刻力挽狂澜的“神反转”，有的只是普通人对于肉眼不可见的病毒的极端恐惧与人人自危情境下的种种无奈。但仍然有这样一群人克服恐惧、奋不顾身，以智慧、勇敢、善良与牺牲精神，来化解人类危机，引领人类奔向光明。这种奉献来自于职业操守，更来自于全社会对于医护人员的期待。在这种社会期望中，个体选择必然面临个体基于社会期望与自我预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自此引发人性光辉的闪耀。

“后启示录”电影是科幻电影中的一个亚类型，它以大灾难发生后的末日世界为背景，关注灾难后的废墟景观及幸存者的生存与救赎。“后启示录”由“启示录”衍生而出，《启示录》(《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预言了末日世界，后启示录则以末日世界为起点展开延续性想象。20世纪以前，“末日情结”是从宗教意义上说，人类对于世界毁灭的恐惧源于神的意志。而二战、冷战与核战威胁、“9·11”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病毒疫病、外星生命等带来的恐惧，让人类逐渐意识到毁灭世界的力量来自于自己，“末日情结”便成为人类对于自身科技滥用以及文明覆灭的焦虑与恐惧。后启示录电影中的末日想象，便是对这种生存焦虑的回应。

英文中“后(post-)”前缀带有对主体词的反思或者批判，后启示录电影以启示录预言的末日世界为起点，探讨末日后人何去何从，天然地具备了人性思索与社会批判的功能。以造成末日世界的大灾难来分，后启示录电影可以分为许多子类，如战争后启示录(《艾利之书》)、核战后启示录(《隔绝》)、生态灾难后启示录(《未来水世界》)，以及病毒后启示录等。病毒后启示录电影包括，《十二猴子》(1995)、《惊变28天》(2002)、《活死人黎明》(2004)、《我是传奇》(2007)、《致命拜访》(2007)、《末日侵袭》(2008)、《天外来菌》(2008)、《末日病毒》(2009)、《第七阶》(2011)、《釜山行》(2016)、《病毒》(2016)以及《生化危机》系列等。

自人类诞生起，病毒一直相伴始终，从鼠疫、天花、霍乱，到艾滋病、埃博拉、H7N9病毒、SARS病毒，再到今天的冠状病毒。病毒与现代文明的深层关系，使其作为要素构建后启示录电影的末日想象时，更具警示寓言和反思批判的文化功能。

## 病毒废墟：生存机制下的权力与人性

后启示录电影与基督教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大部分后启示录电影的基本叙事框架遵循着“末日降临—生存/救赎—新生”的模式。《我是传奇》开始便营造了一片城市废墟景观，病毒侵袭后的曼哈顿岛空无一人，杂草丛生、动物横行，所有的城市文明产物都成为一片废墟，奈维尔上校作为幸存者孤身一人在城市游荡，通过和商店里的假人对话找回其社会性，这种巨大的孤寂、绝望与衰败的废墟景观是后启示录电影的影像特点。《惊变28天》中病毒蔓延后空无一人的荒凉伦敦和教堂里堆满的尸体，《十二猴子》中因病毒盘踞而寸草不生、终日严寒的大地，这些视觉上荒凉与衰败的病毒废墟无不带有末日想象的色彩。在这种陌生化的废墟空间里，人类社会的文明、法律规则等日常生活经验失效，幸存者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生存成为了最首要的问题。

在末日废墟的极端环境中，生存机制与权力、人性的互动显得格外醒目。在一些末日想象中，社会秩序还未被完全毁灭，残存的政府掌控着生存机制。《第七阶》中，全面暴发的流感是政府的一场阴谋，是经济衰退时控制人口过剩的计划，鼓励人类自相残杀，活下来的人就可创造新世界新秩序；《末日侵袭》中，政府设置高墙，高墙外的人类进入无政府状态，自生自灭、互相残杀，高墙内的社会也因不堪承载而陷入崩溃的边缘；《釜山行》中，病毒全面暴发，但政府仍在隐藏事件真相；《天外来菌》中，政府为抑制病毒扩散，下令用核弹炸毁疫区，但核辐射却助力了病毒的扩散。

当政府缺席，社会秩序不复存在后，生存机制便简化为原始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在此之下展现的人性触目惊心。《惊变28天》中，驻守在曼彻斯特的几个军人组成了安全区，他们凭借武器力量，谎称能为幸存者提供庇护。当主人公吉姆获得反击力量后，对这群军官进行了暴力屠杀，带领两个女性突出重围；《末日病毒》中，哥哥为了生存不得不抛弃已被感染的女友，而当他也染上病毒并成为弟弟生存的阻碍时，则被弟弟杀死。亲情与爱情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机制面前轰然倒塌，病毒之下，有着比病毒更可怖的东西。

当然，一些电影也在末日废墟和人性乱象之外延续着温情。《釜山行》中的父亲加入拯救队伍，自己遭到感染后，为救女儿和孕妇自杀而死；《惊变28天》中，在被病毒占领的恐惧空间里，幸存的4个人在郊外美丽的自然风光之下的短暂逃离，使人逐渐意识到比生存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撑与信任的情感。

## 病毒之源：人类原罪与救赎之路

在寻求生存与救赎时，所有影片都指向一个问题：病毒由何而来。《十二猴子》中，病毒学家的助手偷出病毒进行传播，因为他相信人类必将终结的启示；《我是传奇》中，医学家将病毒研究用于癌症治疗，结果引发了突变，90%的人口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生化危机》中，保护伞公司为军方研发生化武器T病毒，员工为换取利益，在偷出T病毒时导致病毒爆发，毁灭了整个地球；《天外来菌》中，军队向太空发射卫星捕获太空生物和细菌，最后捕获到一种无法控制的致命病毒。

后启示录电影本身源自20世纪后人类力量的不断扩张造成的恐慌。当这些力量无法控制、人的欲望无法遏制的时候，末日审判必然降临，是人类的狂妄与贪婪、堕落与丑恶让他们自食其果。电影中探讨病毒的来源是为了最终的救赎，这种救赎分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幸存者找到安全区，保证自我生命上的安全；第二层次是在自我生命得到救赎的前提下，要找到消灭病毒的方法，帮助其他人拯救生命；第三层次是，在生命得到救赎的情况下，精神与灵魂也要得到救赎。对应救赎的三个层次，能在电影中找到不同的救赎结局：《活死人黎明》中，逃出病毒与丧尸的包围后，幸存者找到的家园却是另外一片聚满丧尸的土地；《末日病毒》中为生存不择手段的弟弟最后幸存下来，然而其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比死亡更为残酷与恐惧。《十二猴子》中，詹姆斯被科学家不断派到过去寻找病毒源头，但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推动着过去既定事实与逻辑的发生，病毒扩散、世界毁灭的结果没有被改变。《天外来菌》中，人类在分析外星病毒时，发现了未来人类传递的消息，告知了可消灭病毒的方法。在这种时空旅行的时间闭环里，人类得不到救赎的宿命论预言令人反思。

## 病毒之思：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与质询

在病毒后启示录电影中，几乎大部分电影中都有丧尸的身影，他们是感染了病毒的人类，失去意识、身体变异，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丧尸是现代文明中人类异化的一种象征。

丧尸是病毒的变体，电影用鲜血淋漓的镜头与骇人的特写加深对病毒恐惧的实体隐喻。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部分电影中，作为病毒变体的丧尸实质上充当的是一种娱乐化、感官化的体验工具，它仅仅作为传递恐怖与刺激的形象存在。这种倾向消解了病毒在后启示录电影中所携带的批判性内涵，一些电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活死人黎明》中女丧尸生子的情节令人震撼，它从人类伦理的意义上唤起了对丧尸尸类归类的反思；《惊变28天》中，吉姆为了自救而杀死变成丧尸的男孩，心中充满负罪感。当吉姆来到军营中，看到长官将变异的士兵琼斯作为“研究对象”禁锢起来以观赏他的癫狂。《我是传奇》中，上校抓回来研究的夜夜魔是夜魔统领的女儿，上校试图为她注射血清以使她变回人类，夜魔的形象不再是娱乐化中用作感官刺激的工具，已经演化成为不同于人的另外一个物种，具有感情和“人性”。

后启示录电影的末日想象基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逻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末日论的预言。关于洪水灾难，在基督教语境中是末日论基调，人类有原罪，救赎需要依靠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体系里，大禹治水中的洪水末日并没有悲剧意味，反而强化了中国人对搏斗精神。中国科幻电影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电影实践并不成熟，文化语境与现实情况都让中国缺乏后启示录电影。当然，关于病毒的影视倒是不少，如1999年的电视剧《一级恐惧》，颇具反思意义，香港也有类似于丧尸的僵尸片，但它们都不是科幻作品。

《流浪地球》以后，中国科幻的发展愈发壮大，但在这样的高热度下，更应返回本源思考科幻的本质与意义到底是什么。科幻不仅仅是呈现未来的想象图景，更应该具备对当下科技与发展的反思与质询。后启示录电影就表达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变着它的关注点。中国需要这类具有反思意义的后启示录电影，并形成独具民族个性的表达。在全球化框架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面对末日想象、面对病毒与灾难，如何更好地关注个体，如何警醒人类重新学会谦卑地对待自然与生物，中国式表达应当给出不同的反思与救赎之路。

# 「末日想象」下的疫病世界

谈病毒与「后启示录」电影

叶昕昀

# 疫情之下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以电影《传染病》为例

张琦

因为疫情的缘故，9年前上映的美国灾难题材科幻电影《传染病》近期受到关注。影片讲述了一个虚拟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且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故事。重温电影，可以发现影片的有些情节带有明显的“隐喻”色彩，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都是一面“照妖镜”，我们既能看到人性中极致的善，同时也能将人性中的恶无限放大，善与恶的两面体现了人类灵魂中的个人自我与集体自我的矛盾性。

## 假面英雄与个人主义的膨胀

比疫情传播更为迅速的是恐慌情绪，与恐慌伴随传播的是谣言。在电影《传染病》中，裘·德洛饰演了一位从疫情初期就一直进行线索跟踪，并指责政府隐瞒真相的网络评论人。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在网上扮演起了“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罗了一大批追随者，并事事以“真相”自居，控诉大药厂与政府勾结散播病毒。在一次偶感风寒之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并开始网络直播。他在直播中试药，声称连翘对于病情有功效，于是掀起了民众疯抢连翘的狂潮。他利用大众的信任，在疫情中获得药厂给予的丰厚回报。

这个情节中蕴含着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的价值逻辑：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必须要满足自我利益，个人的价值排序优先于一切，即无论在如何的关系情境

中，“我”个人的利益都要被优先获得。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经典传播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适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众，大众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再单一，这种传播模式对于国家机器而言有了一个很好的监督效用。然而在特殊的疫情时期，谣言伴随恐慌产生，当这种传播模式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时，就有可能变成误导普通大众、妨碍政策执行的“温床”。这些在网络空间呼风唤雨，而实质上只想借着疫情之便为自己牟利的人，实为败类。

## 集体自我与人性温情的闪耀

《传染病》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角色便是凯特·温莱斯特饰演的美国疾控中心被派往疫区的工作人员米尔斯。她作风果敢、敬业内敛，对疫情做出了快速且准确的判断。当疫区封城后，米尔斯只得留守疫区。深夜，她因发热咳嗽惊醒，出于专业她判断自己已经染病。在给出司打电话告知自己病情时，米尔斯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但就算在那个时候，她仍然一丝不苟地隔离自己，挨个给与自己密切接触的人打电话。此时镜头一转，画面上出现她躺在医院中奄奄一息的情景。米尔斯试图将自己身上的羽绒服递给旁边喊冷的病患，医者仁心，只可惜手只递出了一半，画面便定格在了她在裹